

蘇聯新語言學

繆靈珠教授著



蘇聯新語言學

繆靈珠教授著

天下圖書公司

一九五〇年北京

蘇聯新語言學

著 者 繆 靈 珠

發 行 者 葛 一 虹

出 版 者 天 下 圖 書 公 司

北京地內米糧庫三號

印 刷 者 政 務 院 財 經 委

一九五〇年六月在北京印造
華北版初版三千冊

·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

目 錄

新語言學的路線	1
舊語言學的迷途	19
語言發展過程的規律性	37
語言與思維間的一致性	55
語言創造過程的階段性	74
附錄：馬爾與蘇聯語言學	104
後記	123

新語言學的路線

『革命的模範，是防止墨守舊習，思想停滯，盲從古舊的傳統之防毒劑』。——斯大林

一切學術上的新路，不是無條件的徒然從舊路踏來，必然首先發現了舊路之引入迷路，所以勇於質疑舊傳統的理論，衝出舊思想的籬籬，跨過了陳腐的屍體，向前邁進。新語言學就是這樣的在反舊語言學的鬥爭中誕生。

向來的歐洲資產階級語言學研究，只局限於所謂『印度歐羅巴語系』的諸民族語，而且偏重語言形態方面的分析。它底方法，從縱的方面，就一種民族語，追尋其字形的沿革和字義的流變，以確定這民族語的來踪去跡；從橫的方面，就幾種民

族語，追尋其語根的淵源類似，和語音的對應現象，以確定諸民族語間的血緣關係，孳乳分播的史跡。誠然，在這些方面，他們的工夫，做得非常深刻精密；他們的成績，也曾有個時期爲學術界所重視。

但是，就研究對象來說，印歐派研究的範圍，既然局限於印歐語這一個系統，由此求得的結論，自然不免貧弱、偏狹、武斷、錯誤。大抵，照西歐資產階級語言學者的看法，以爲歐洲若干個文明國家的民族語，已經發展到完滿的階段，在文學史上也曾留下許多燦爛的紀念碑；而許多野蠻民族的語言，還滯留在原始的、簡單的、未充份發展的階段，無甚研究的價值。所以就優秀民族語研究所得的結果，自然可以概括一切民族語的特質。因而，他們的興趣：重視文學的詞藻而輕視日常的口語，重視死語的流變而輕視活語的發展，重視衰老的民族語而輕視方生的民族語，重視資產階級的文飾而輕視廣大羣衆的簡樸。這種學術態度，不但偏狹向隅，迷戀枯骨，而且處處顯出反科學的、反歷史的、甚至反語言本質的謬誤。

無疑的，印歐系諸民族語的範圍甚廣，地域雄跨全歐，歷史有數千年，在語言學上固應有相當的地位；但是投入全世界各語言體系裏面，它僅僅是一個單位而已，除此之外，還有許許多多旁的語系，各有其特質，各有其價值，其重要性其實不在印歐語之下。嚴正的科學態度，不但不應『以偏概全』，而且亦不應『捨全求偏』。希望從局部的素材求得全部的真理，固是一種幻想和錯誤；離開了全部的體系來考察局部的現象，也難免陷於武斷與偏見。印歐派的毛病，就在于『以偏求全』，而且『捨全求偏』。他們一方面冀圖從局部的語言現象求得一切的語言特質，他方面又抹殺了非印歐系語言的研究價值。結

果是墨守着一角園地，臆想大千世界，以至自立藩籬，栽成毒種。這種學術態度是唯心的、反科學的。

無疑的，印歐系諸民族語，比較別系語言，已發展到更高的階段，而且有着優秀的文學遺產。但從語言發展史的觀點看，今日的印歐語系僅僅代表着一個階段而已。以前有過某些民族語，曾發展到相當階段，後來便隨該民族政治勢力的衰老而衰老，隨該民族生存能力的滅亡而滅亡；今日也有些民族語，正方興未艾，將來可能隨着該民族政治勢力的發展而發展，隨着該民族生存能力的演變而演變。一切的語言現象，盡是不斷在運動，不斷在變化，不斷在革新，不斷在發展。任何時代，始終都有某種語言方在產生而漸趨發展，始終都有某種語言方在衰老而漸趨滅亡。所以，來者未必不如今，今者未必不如昔。嚴正的歷史態度，不但不應遺棄方興未艾的現象，而且重點不在於現時似乎美滿但已經開始衰替的現象，而應在於現時方在發展雖未臻於美滿的現象。從歷史觀點看語言，方在發展的語言，比較漸趨衰老的語言，不但不減重要，而且有着更豐富的素材，孕育着更多的可能性。印歐派的大毛病，就在於『迷戀過往』，而且『忽視未來』。這種學術態度，是守舊的，是反歷史的。

無疑的，文學遺產以至古典文字，是更典雅、更複雜、更嚴謹的；但是語言的生機始終寄托在口語上。語言能夠不斷地在廣大羣衆的口上流轉，與日常生活結合起來，纔日漸豐富，日漸精密，形成文藝的語言。反之，假如語言不在人民口中運用，便失掉了反照現實的使命，勢必始而萎弱，日漸枯槁，日漸硬化，終成死語。從前有過某些民族語，曾在人民口上豐富起來，但終歸因為離開了口語而至死亡，而至蛻變。在語言史

上，我們看到古希臘語之變成死語，古拉丁語之萎弱蛻變。這是歷史的昭示。活的語言，從口語中獲得生機，死的語言，僅僅在文字上留下殘骸。所以，口語是語言生命的起點，文言是語言歸宿的坟墓。嚴正的學術態度，不但不該『捨本求末』，而且也不應『以古擬今』。印歐派的毛病，就在於『捨本求末』，而且『以古擬今』。他們一手靠着死語坟墓的邊沿，一手推開活語蓬勃的生命。他們一邊捧着死語硬化的骸骨，一邊夢想去理解活語靈活的機體。這樣，他們的錯誤便不可避免。這種學術態度是武斷的、反語言本質的。

我們並不否定印歐系諸民族語在語言學上的重要地位，但是，我們要反對排斥非印歐系語；我們不否定高度發展的語言在語言發展史上的重要貢獻，但是反對輕視方在發展的語言；我們並不否定文學遺產和古典文字在字源學上以至考古學上的重要價值，但是我們反對忽視口語的研究。我們認為：印歐派的研究成果，固然有許多不能否定也不應否定的價值，但是我們必須揚棄它理論上絕大的謬誤，衝出它重重的藩籬。

十九世紀末葉，歐洲比較語言學派，曾經一度衝破了印歐語言學的藩籬，擴大了語言研究的範圍至於非印歐系的諸民族語，從而掘發了許多新材料和新事實。但是，語言學本身的原理仍是故步自封，思想停滯，不因新材料新事實之發現而從新檢討，觀點和方法仍一依舊派的轍跡。馬爾曾說過：『正確的語言學，以前是未曾有過，時至今日，亦未曾建立起來。在全世界語言之中，真正能夠從科學的語言學立場上加以研究，而且曾建立了一般學術理論的，差不多僅限于印歐語系諸民族罷了。語言的教學，尤其是一般語言學的課程，幾乎全部落在印歐派學者手上。所以，語言學一般的理論，以至研究語言的方

法，皆依照印歐派的傳統，不但只以印歐系諸民族語爲研究對象，而且往往通過印歐語的語法來思維。一般說來，除印歐系諸民族語之外，幾乎沒有一種語言，能够得到充份的研究』。這是過去語言學的實在情形，馬爾的話不是無的放矢的。

十九世紀末葉，歐洲歷史派語言學，提出了語言發展史的研究，主張根據『轉折語』發展過程中的語言形態來分析比較，以推求語言發展的原理。譬如，根據若干民族語的形態沿革以及其義意流變，比較這些現象，以推求語言發展的通例。然而，這裏所謂『轉折語』者，無疑是指印歐語而言，言下之意，無異默許語言有充份發展的和不充份發展的兩大分野，彼此對立，而非發展過程的兩個階段。這種見解，始終沒有擺脫印歐派的傳統。他們的研究重點，當然只落在印歐語上面，而且特別偏重該系的死語（如古希臘語，古拉丁語，古北歐語等等）；對於非印歐語，雖不至於排斥，但沒有給以相當的重視。他們的歷史觀念，重視追尋過往的陳迹，而輕視掘發未來的可能性；因此他們重視死語的流變，而輕視活語的發展；重視文字形態的分析，而輕視口語中孕育着的語言本質。所以舊派語言學的藩籬，始終沒有被突破。

晚近歐洲社會學派語言學者，曾改弦易轍，拋開死語而轉向活語。他們深入民間，搜集民謠掌故，研究民間風俗，使民間文學與民俗學結合起來，使語言與生活連結在一起來考察。這種方法，當然比舊派邁進一步，可是他們的觀點，依舊是資產階級社會學的觀點，並沒有把語言學奠立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之上。他們的出發點，依舊是資產階級語言學的傳統，沒有拋開印歐派的包袱。換句話說，他們『通過印歐語的語法來思維』，以印歐語的語言現象來解釋非印歐系的口語。這不過是

印歐派原理的推廣運用而已。

綜上所說，可見過去語言學之大患，在於其『局限性』和『偏狹性』，而且因其局限性和偏狹性，作繭自纏，陷入日暮窮途的窘境。

二

『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與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
是絕不相容的兩個口號』。——列寧

毫無疑義，這種局限性和偏狹性有其意識的根源的，這裏鮮明地反映出種族優越感和階級優越感的細菌。在文化還把握在資產階級手上的時代，在法西斯思想還未滅絕的時代，反動的階級偏見和種族偏見，處處毒害了西歐的學術思想；即使如語言學這樣比較客觀性的科學，也不免受到傳染。

保羅·梵洛希（Paul Valéry）在論『歐洲人』（Homo Europaeus）一文中傲然的說道：

『此間必須說明：所謂歐洲人的氣質，何以獨優於其他種族的人類劣種。歐人者，是一種不平凡的生靈。他有着光榮過往之追憶，他懷有鴻圖大略，他渴求智識和無盡的寶藏。他既然生存在一個曾一度統治全世界的國度裏，而且夢寐難忘昔日的凱撒、查理曼、拿破崙，所以他的心目中總有一種驕傲，一種希望，一種躍躍欲試的雄心。他既然生存在這樣的時代，這樣的環境，眼見着如許驚人的發現，如許成功的冒險，所以世間沒有任何一種非其所能夢想的偉業與科學的創見。他置身於無窮的展望和光榮的回憶之間，所以即使有時會陷入悲觀，但是悲觀反令他不期然而產生第一流的作品。他不會頹然若喪，但失望反令他

寫出絕妙哀歌。有時候，從這樣的心理根源，他反獲得一種堅強不屈的意志，一種明知不可爲而爲的雄心，甚或傲視人生，鄙夷人類』。

梵洛希的文章，寫在法西斯氣焰高張的時候，淋漓盡致，反映出所謂『歐洲人』——歐洲的法西斯主義者——目空一世，唯我獨尊的種族優越感。由於帝國主義侵略的進展，由於殖民政策的成功，侵略者對弱小民族，不但在政治上以征服者的地位自傲，而且在文化上以先進者的資格自居，氣焰迫人，躊躇志滿。在他們的眼裏，異族文物，既然不能與歐人文物相比，異族語言，自然不能與歐語同列。這種狹隘的種族偏見，往往成爲西歐文化的銬鎖。而在語言學方面，便成了自困的垣墻，於是認印歐系語言是最優秀的語言，把非印歐系語言排斥於學術圈外，視若無足道者。

法西斯細菌，散播在語言學上，便培植成反動的種族優越論。認歐語爲最優秀的語言，勢必認歐人爲最優秀的民族；認歐人爲最優秀的民族，勢必認歐洲爲最優秀之邦；所以歐洲應爲世界表率，歐人可以任意宰割天下——這就是法西斯主義者的荒謬的、反動的『邏輯』。在納粹氣焰千丈的時代，德國語言學者，便把語言學說和反動的種族學說連結起來，他們把印歐派的所謂『原語』說應用到日爾曼語上，冀圖證明古日爾曼語爲印歐系諸民族語之共同根源的『原語』；因而，日爾曼人爲最優秀的民族，理應統治世界，所以德國便頗有理由要求實現其『第三帝國』的幻夢了！莊嚴的學術，便這樣的在納粹手上慘受蹂躪。

今日語言學，爲了掃除法西斯細菌，粉碎偏狹的反動的種族主義，導莊嚴的學術於正確的科學的途徑，首先必須打破資產

階級語言學的垣牆，擴大語言研究範圍，以嚴正的科學態度，正確的歷史觀點，來處理一切語言——超越種族界限，不拘發展先後，包容古今，概括雅俗。所以新語言學主張盡量搜羅一切語言現象，無論文明的或野蠻的民族語，古語或今語，死語或活語，衰替的或方生的語言，文言或口語，俚語或方言……均在研究之列，使語言學的基礎擴大到『世界性的規模』。因為，唯有從這樣廣博的、豐富的素材掘發，始能夠發現新的事實，提供新的學理。

這種研究工作，無疑是十分艱巨的。新學說的建立，本非朝夕之事，學術無捷徑，捷徑只導入歧途。要推翻舊的學說，必須提供新的事實，空虛的理論鬥爭，無補於事，唯有具體的事實，纔是有力的反證。所以，新語言學必須跳出舊語言學的覆轍，另覓新路，從而掘發新的事實。這條新路，先從舊語言學所忽略的、所輕視的弱小民族語和民間口語出發。近年來蘇聯語言學者，孜孜不倦的從事高加索諸小民族語及口語方言的研究，他們發現了許多直至馬爾之前沒有人注意過的新事實和新現象，證明了：活語比死語保存着更多的語言發展之遺跡，口語比文藝語言有着更豐富的表現力，方生的語言比衰老的語言更明晰的反映出客觀現實。這一下便衝破了印歐派的藩籬，替新語言學鋪好了康莊大道。

資產階級語言學，並非絕對拒絕研究弱小民族語，但是他們臨之以蔑視的、鄙夷的態度。由於認弱小民族須附庸強大民族這種偏見，他們便默許弱小民族語須附庸強大民族語，前者的特質已經包容在後者的特質裏面；因而，他們往往通過印歐語的語法來解釋弱小民族語，以至陷入荒謬絕倫的結論。再則，資產階級語言學者，並非絕對拒絕研究民間口語，但是他

們臨之以觀照的、玩賞的態度。由於認資產階級優越於無產階級這種階級偏見，他們便默許資產階級的文飾優越於人民羣衆的口語，前者是語言的精華，而後者是語言的渣滓；所以他們之搜集民歌、掌故、俚語、方言，是出於閒情逸致觀賞的心情，而不是以愛護的同情，以正確的科學態度，來掘發口語中所蘊藏的特質和表現的力量。結果，他們的研究只是皮相的認識而已。

新語言學，恰好與資產階級語言學相反，不但要否定偏狹的種族優越感，而且要掃除偏狹的階級優越感，因此，新語言學提出『語言的國際主義』這口號。

語言的『國際主義』，正如政治的『國際主義』之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堅決反對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與沙文主義，反對種族間或民族間的不平等與壓迫，——它站在人民大眾立場上提倡民間口語的研究，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語言學的偏狹性與局限性，反對歧視弱小民族語。馬爾說：『照語言學現階段的工作而說，新語言學的目的，首先注重研究活的、方興未艾的民族的文字與口語，尤其是人民大眾的口語，而且跟人民大眾的命運——其生活狀態——緊密地連繫起來考察。』

列寧曾寫道：『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與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是絕不相容的兩個口號。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中，它們是跟這兩個大階級陣營相適應的。它們反映着兩種政策，兩種世界觀』。資產階級的世界觀與政策，是基於民族主義與沙文主義的；因為資產階級的權勢，端賴階級間與民族間的不平等與壓迫。顯然，所謂『民族主義』，不過是不平等與壓迫之掩護色而已，其真正的含義，是否定其他民族的正當權利，蔑視其他民族的文化，以至壓迫其發展。這反映在語言學上，便表現

爲蔑視以至於排斥弱小民族語與民間口語之研究，曲解以至於否定弱小民族語與民間口語之價值。政治範疇的毒素，注入思想範疇之中，便害怕了真理。恰好相反，無產階級的世界觀與政策，是基於國際主義與民族平等原則的。因爲，在勞動人民爲推翻資產階級統治之偉大的解放鬥爭中，必須國際間無產階級以兄弟之情誼團結一起；在弱小民族爲打倒法西斯侵略之偉大的反帝鬥爭中，必須國際間各民族以平等之原則輸誠合作。所以國際主義並不與愛國主義背馳：無產階級深愛自己的祖國，並且爲它的自由而反對國內的壓迫者與國外的奴役者，因而團結國際間一切反壓迫反侵略的勞動人民；無產階級深愛祖國進步的文化傳統，並且爲它的發揚而反對國內的文化摧殘與國外的文化侵略，因此以愛護的同情尊重其他民族進步的文化傳統，以至幫助落後民族的文化發展。這反映在語言學上，便表現爲（一）熱切掘發本國民間口語的特質，並以同樣的熱情，推廣其研究以及於一切民族間口語的特質；（二）重視發揚本國語言的民族形式，並以同樣的重視，推廣其研究以及於落後民族語的民族形式。新語言學特色之一，就在於其國際主義的精神。它絕對反對資產階級語言學的偏狹性和局限性，因而不斷的擴大語言研究的範圍；它絕對反對資產階級語言學的民族偏見和階級偏見，而代之博大的、無我的世界觀。所以新語言學之異於舊語言學，不但在於研究範圍的廣度，而主要在其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不但在於把握問題的深度，而主要的在於其國際主義的精神。

以這樣的世界觀與精神，馬爾提出向民俗學、活的口語和現代民族語學習這口號——他高呼『到活的口語豐富的材料去！到語言的民衆路線去！』

綜上所說，我們可以引用馬爾之言作為語言學的『國際主義』之結論：

『照雅弗語系派的理論，新語言學是活的語言研究之成果，它超越了種族界限，超越了封建思想，超越了布爾喬阿的階級偏見，種族偏見，以及一切惡意的偏見，超越了弱小民族語須附庸大國語言這種奴性思想，超越了迷戀死的古典語言這種社會階級意識的偏愛。雅弗派語言學，認為研究語言，必須撕破偏重任何語言羣或特權階級語言這種局限性。』

三

『企圖將外間的客觀世界局限於自己主觀思維的

框子中，是荒謬得可笑的』。——恩格斯

其次，就研究方法和觀點而言，資產階級語言學，往往陷入形而上學觀念論的覆轍。照他們的看法，語言是一種孤立的實體，與社會生活絕緣，語言的流變，是由其固有的性質所決定，不受客觀現實所制約，不依歷史過程的軌迹。所以他們只滿足於語言素材的研究，而忽視語言所孕育着的階級意識，只滿足於語言形態的分析，而忽視沈澱在語言裡面的歷史意義。這種方法和觀點，無疑是絕大錯誤。

我們必須知道：在現實界中，任何一種現象，均不是孤立的實體，均不可以與其他現象絕緣，超然而自存，獨立而發展；相反的，諸現象之間，有着密切的連繫，彼此關聯，互相制約，依照一定的規律發展。如果把一種現象離立於其週遭所關聯的、所制約的現象之外來考察，便不能把握到其神髓，這是辯證法所昭示的真理。所以，研究語言，萬不能墨守語言本身

的素材，或僅就語言學本身的原理加以發揚。反之，我們必須一方面擴大語言學的對象之範圍，使之包括一切語言現象與事實，他方面擴大語言學的學術之界限，使之侵入考古學，人種學，及其他社會科學裏面，並且與一切社會現象和意識連結起來，就其間的關係影響，尋求語言學的原理。

要之，資產階級語言學之大患，就在於違背了辯證法的真理。因而，他們認語言為自滿自足、無所依存的獨立體系，由於這種『孤立絕緣』觀念，他們關於語言的內在關係，則視語言與思維彼此離立；關於語言的外在關係，則視語言與現實間無必然性的制約。我們試批判他們的錯誤。

第一點，就語言與思維的關係而論，語言這東西，作為一種傳達人類思想感情的媒介，是社會意識的荷體。從外形看，語言不過是一列有系統的音符（如印歐系的拼音文字），或者是一種特殊化符號象徵（如中國的象形文字）而已；但是從內容看，這些音符或象徵所表達的意義，就是人類思想感情本身。每一個歷史時代，每一個社會階層，人們有其特殊的思想感情，這些思想感情之體現，便成為某一時代、某一階層的語言所傳達的意義。是客觀的存在決定人類主觀的意識，所以是一時代社會生活決定語言的內容。反過來說，則語言內容在在足以反映出某一時代社會生活之諸般面影，和某一個階級集團的種種要求。所以社會的現實，由經濟生活而至全部社會意識，皆沈澱在語言裏面。

時代變遷，社會鼎革，階級權力有所轉移，生產關係有所改變，或者物質生活有所創現——這一切均足以刺激新的觀念、新的意識之發生，於是這投射到語言上面，便使語言的內容不得不更改前觀，舊時代的語言遂荷上新時代的意義。所

以語言的意義不斷在沿革，不斷在變遷，其沿革變遷皆受客觀現實所約制。但是語言的形態，既已硬化，既已定型，便帶上一種惰性，往往不能以同樣的速率跟着內容沿革而沿革，演變而演變。當新的觀念發生而沒有現成的新語彙足以表達其意義的時候，人們往往有意無意的乞靈於舊語彙的寶藏，或則直接採用舊詞而付與新的意義，或則憑藉舊詞的新組合，以表達新的觀念，使語言的形態與意義間的矛盾復得到統一。再則，當新觀念之量的發展達到舊語言再不能與之適應的臨界點之時，它便突然衝破了舊的語言形態，或者排斥了阻礙其發展的舊詞彙，或則打破局限其發展的舊組織（如文法規律，句法結構等等），使語言進達到根本的變化，『質的變化』，而向更高一階段發展。在這場合，語言便經過革命的過程而求得矛盾之新統一。在語言史上，我們看到中世紀末葉歐洲諸民族民間語之替置了統治階級的拉丁語，十八世紀中葉民間俄羅斯語之替置了教廷的斯拉夫語。

所以語言形態有千百條線與其意義相連，也有千百條線與社會意識以至社會生活相連，唯有找出這些線索，我們始能理解語言與思維間的綜錯的關係。資產階級語言學並非絕對沒有研究語言與思維間關係的問題；其實，過去字源學者、訓詁學者、考古學者、就專門致力於從語言形態的演變追尋語言意義的演變，其所犯的錯誤，不在於忽略語言與思維的關係，而在於把語言與思維劃成兩個範疇，離立而處理。他們從語言的形態出發，認語言僅僅是傳達思想感情的音符或象徵之體系而已。照他們的看法，這些語言形態——在文字爲形，在口語爲聲——完全是獨立的、自發的、武斷的、無原則的，所以對於其所傳達的意義沒有任何必然的關係。譬如，呼甲物爲樹，呼